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Zhishi Zhuanxing Yu Xinwenxue Fasheng

火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3JK0259)、陕西理工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陕西理工学院2013年校级人才启动项目(SLGQD13-41)资助出版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Zhishi Zhuanxing Yu Xinwenxue Fasheng

火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火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641 - 6

I. ①知… II. ①火… III. ①新文学(五四)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33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415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解决问题的思路	(7)
 第一章 中国现代知识转型	(11)
第一节 知识和知识转型	(12)
一 知识与文化	(12)
二 知识型与知识转型	(18)
三 “现代知识转型”及其在中国的敌人	(22)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知识转型	(29)
一 新知识界的形成	(30)
二 知识场:新知识人的文化活动	(43)
三 新学界转向:从日本到欧美	(55)
四 现代知识的扩展和深化:新知识与新人	(61)
第三节 中国的现代知识转型	(73)
一 中国现代知识型中的专门性	(75)
二 新知识:无根的工具	(83)
三 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88)
 第二章 新知识人的身份与思想	(94)
第一节 新教育界的新角色	(95)
一 学潮与新教育界	(96)
二 学界的独立构想与自治运动	(100)

2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三	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内心冲突	(106)
四	《新青年》同人与学生青年	(112)
第二节	新出版界中的新知识人	(117)
一	新书店和新知识人	(118)
二	新书店之间的争夺	(124)
三	新书店和《新青年》同人	(128)
第三节	两种知识范式及其融合	(140)
一	两种知识,两个集团	(141)
二	国与学	(150)
三	方法引入和整理国故	(160)
第四节	知识斗争带来的身份与思想	(165)
一	新知识人的身份认同	(166)
二	新知识人与士大夫	(173)
三	有身份的思想或文化模式	(180)
四	启蒙的姿态	(186)
五	致用的学术与革命	(190)
第三章	知识转型与新文化运动	(196)
第一节	《新青年》同人的历史任务	(197)
一	《新青年》同人在新知识人中	(197)
二	当新知识界遭遇民国	(209)
三	《新青年》同人的使命	(222)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225)
一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转型	(226)
二	深层知识的困难	(230)
三	走向新知识的统治	(236)
第四章	从知识转型到文学转型	(243)
第一节	文学知识与文学转型	(244)
一	文学也是知识	(244)
二	分科挤压出来的“文学”	(250)

三 新文学与新知识	(260)
四 知识转型与文学转型	(266)
第二节 文学革命与文学知识	(271)
一 知识动力下的文学革命	(271)
二 “不用典”与文学革命的对象	(281)
三 两种范式的斗争	(286)
四 文学革命与非知识性	(293)
第三节 转型的新文学参与者	(298)
一 新文学家的身份	(299)
二 现代文学知识核心	(307)
三 身份与文学观	(314)
第四节 新文学的知识范式	(322)
一 “悬浮”的文学理论	(323)
二 “文学”压抑文学	(330)
三 文学史统合文学教育	(336)
四 新文学知识与文学感受的张力	(343)
第五节 文学新范式与文学传统	(350)
一 挥不去的旧文学	(351)
二 文学经典和新经典	(359)
三 新文学传统:问题及出路	(365)
结论	(370)
参考文献	(372)
后记	(401)

导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新文学”之名在黄远庸《释言》（《甲寅》10号）中已经出现。作者提到“新文学”时心中想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含义比我国古代宽泛的“文献学术”狭窄了一些，越来越接近现代的“文学”意义。按“文学”的近代内涵来使用“新文学”一词的实际上是《新青年》同人。钱玄同在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中称赞曼殊上人的小说“足为新文学之始基”，并认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①。这里钱玄同就是从“描写人生真处”“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和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等方面定位新文学的，从思想内容和文体语言两方面来立论，已经是“新文学”的现代意义。

“新文学”之名得自文学革命，因为要革命，自然需要建立阵营，旗帜上分别写着“新”和“旧”。《新青年》同人中钱玄同的新旧对立意识是比较强的，所以恰恰由他先命名“文学”的“新”，他所谓的“新文学”就是他同时提到的“现代文学”，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今日之文学”所指相差无几。更明显的是，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将“老文学”与“新文学”对举，进一步突出两者对立的意味。

此时“新文学”的名称有了，那么创作实践情况如何呢？按照钱玄同的意见，梁启超那里就是新文学的开端了。此时出现的“文学”中的新旧不仅指时间先后，而且有着价值高下。它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文

^①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

2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学，其内涵有待大家讨论，然后加以实行。其名既立，循名责实，接下来就是胡适、周作人等人进行的理论建设，寻求名称对应的内容是什么。真正的创作则主要指同人们在诗歌上的尝试，以及鲁迅在新式小说方面的贡献。

新文学自发生以来，人们不断地探寻它发生的原因。因为这个新东西如炸雷，仿佛从天而降，似乎没有征兆，使得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地位变得十分可疑。陈独秀就曾提到，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以致发起者都觉得有必要加以解释，这就有了陈独秀所谓“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①的归因，有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的溯本追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新文学”寻找历史必然性。

从此开创了新文学探源的研究方向。1949年前，周作人的“晚明说”引发任访秋先生对李贽思想的追溯，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梳理了从李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封建意义的进步思想”的流脉。除此以外，对新文学的探源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随着对现代文学的回归和反思，因为寻找现代性的源头而逐渐把现代文学（“新文学”是其一部分）的源头推进到晚清，最终形成了“一体论”和“压抑论”两个叙述方式^②，这个“晚清说”导源于对“五四说”的反思。“五四说”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新文学”源头的最直观也是最主流的观点，后来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定更是一家独大。50年代以来，无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70年代末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继承此说，使得新文学探源的其他路向受到压抑，直到80年代才重新启动。

对“五四说”的质疑来自美国汉学界，此前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在晚清（见《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说在大陆学界很快获得响应，出现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章培恒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

① 陈独秀：《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40页。

② 杨联芬：《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

题》、范伯群的《在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等主张“一体论”的学说，主张晚清文学和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两个阶段，统一为现代文学。

与此同时，美国汉学家沿着原来思路发展，产生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王著认为晚清的现代性更丰富，新文学压抑了现代性，使得现代性单一化发展，这就是另一条所谓“压抑论”的道路，是在“一体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此以后，晚清研究成为比五四研究更为热门的领域。“晚清说”兴起较晚，但势头强劲。

其他研究路线首先还有“辛亥革命说”^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辛亥革命有着潜在的关联，辛亥革命为新文化和新文学做了人员准备，成为源头之一；其次有“魏晋南北朝说”^②，受鲁迅的启发，从文学自觉这条线索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源头；再次有“明末清初说”^③，按启蒙思想的流脉追溯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自我精神的强调和君臣观念的突变，从其“重证据”的学术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对五四的影响等方面“确证”其源头意义；最后还有“多重对话说”^④，不是从历史上寻找源头，而是从新文学发生时刻的内部差异思想的碰撞，还原其内部建构的思想源头。

近百年的新文学发展历程几乎与新文学探源的工作同步，有识之士从各种角度提供自己的答案，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启发，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思索。有些探索满足于找到表面的相似性，因为新文学身上有个性解放，就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晚明以及清初的思想家的观点和运动，便认作远祖；因为新文学身上有文学自觉，在魏晋名士那里又看到一点自觉的影子就以为源头，这类行为似乎与为抬高身价而认同姓名人为祖宗的旧习惯相类似。

“晚清说”在批判反思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性研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确打开了新文学研究的新视域，清末民初的出版等文化机制的推动作用

①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② 陈方竞、刘中树：《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文艺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③ 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④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受到关注，但是无论是“一体论”还是“压抑论”都是在反拨早先片面夸大“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性，虽然学术上这种转移是正常现象，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意气留下的理论盲区。把在共同社会条件下的通俗小说也融进视野，实际消除了新文学发生问题，把新文学发生问题放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这个问题里面考虑。现代文学性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现代”的概念日益泛化，结果发现无所不现代，忽视了新文学运动的绝大功绩。现在已经有人回归新文学的提法^①，这个提法当初是作为二元思维的意味而被抛弃了，现在重新出现说明现代性的追溯法已经出现阐释危机。

总体来说，新文学探源工作之所以旷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对新文学发生的机理一直没有弄明白。人们习惯于认为历史是积累式发展的，怀疑新文学爆发式的发生。

“压抑论”是解释现代性与新文学革命性的一种框架，不过王德威在“中国中心观”^②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新范式的影响下，继续在中国历史中寻找现代性的“苗头”。柯文总结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出现的“中国中心取向”像大部分后现代主义思想一样只涉及思想者，并不一定涉及历史本身。尽管“西方中心模式”是可疑的，但是“冲击—反应”的史实仍在，当时人的震惊仍在，不能因为描述者有主观立场，他所描述的一切都被歪曲，其实这种看法倒是歪曲的一个表征。是的，历史有多重可能性，是的，我本来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厨子，因为我炒菜还算好吃，我还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因为我曾经在绘画兴趣小组混了很久，但是我现在没有成为厨子，也没有成为画家。你绝不应该因为不满意我搞的研究，而去找我作为画家的证据。王德威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直达明代小说和到中国历史中找新文学源头的行为一样，都卷入了历史的魔障，无论因为后现代的批判精神，还是因为前现代的认祖归宗心态，都是对历史实情的歪曲。

之所以此处要批判后现代的这种干扰，是因为本书的立场与此不同。不因为后现代思想的时髦而带上先入之见，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复现和分

① 刘纳：《五四能压抑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析新文学发生的过程。作为本书的榜样，值得一提的有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历史感使他从爬梳史料中找到《新青年》同人与辛亥革命之间的联系，在社会活动层面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的集结；还有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这本书进入新文学发生的思想细节，认真突破大而化之的宏观视野，用具体史料反映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思想；还有沈卫威先生的《自由守望》在人物关系层面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让我关注历史人物的关系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受这些学者做法的启发，本书的内容兼顾了人物活动和思想斗争。

面对现代文学转换的迷局，为了搞清它实现的机理，我的问题是：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为了免于陷入“现代性”的争论（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它热闹的时候了），我还是着力解决新文学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新文学发生问题是个立体的问题，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的问题。研究新文学发生没有比研究其提出者更直接和合适了。追溯新文学发生的原因，《新青年》杂志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点。这是因为它记录了中国几十年间思想斗争和变迁的历程；它具长久的阐释魅力，作为源头它不断被追溯，后来者总要从它那里找到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自《新青年》出现以后，中国文化呈现出新特点。

《新青年》同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把新文学发生的问题就近还原为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看到《新青年》同人的很多观点其实都有早期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指向一个新的知识团体的产生。从人物活动的层面介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带来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同人是如何活动的问题，让我们注意这个知识团体，它的发生又与清末民初中国整个知识界转型有关。知识界的转换背后隐藏的是知识的转型。

知识转型的概念实际上暗含着知识中存在范式转移的情况，也就是认为知识的发展存在不连续性。“知识转型”的概念来自两个源泉：一个是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一个是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概念。它们使我们可以从知识转变范型的角度理解中国西学东渐以后的巨大转变，特别是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在清末民初中国存在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接近和转变的知识转型，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变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但是，我认为在清末民初不是单纯的西学的输入，而是发生了在西学知识催逼下的范式转换，这样才好理解中国此后的思想方式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

新文学的发生意味着文学的转型，这个转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与知识转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些问题导引我们把文学与知识结合起来进行思索。

文学和知识的联系一直局限于文学教育这个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用文学来教育（李广田就是在这个角度运用这个词汇^①），第二个是关于文学的教育（一部分学人如陈平原、罗岗等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中从这个角度展开）。后一种意义的基础是文学本身的知识化问题，而前一个意义的基础是文学作为知识载体问题。前者是文学效能问题，后者是文学传承问题。前者是作家的事情，后者是教育家的事情，就算作家参与后者也不以作家身份，如老舍写《文学概论》，沈从文讲小说做法，此时他们都是关心文学教育的。

罗岗以文学教育为线索考察现代文学的建立，也将文学当做知识来考察。^②他提到关于文学的知识，但是没有研究其内涵。罗岗关心的虽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制”出来的问题，即文学的现代转型，但是他强调的是观念的整体建构，是制度层面的影响，主要讲一般的权力和文学教育的关系，并不具体关注用什么知识来教育。

陈平原有意回避文学教育与权力的关系，对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和文学教育方式的转变，以及新文学如何进入课堂等历史细节，加以历史还原。文学教育偏于教育方面，其次关心的是文学学术。总体来看，教育史意义大于文学史意义。

文学与知识的关系范围实际上要比文学教育领域广阔。首先，按照波兰尼的观点，知识除了可以言传的知识以外，还有隐性（默会）的知识，是不能靠言语来传递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考察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但是也可以通过对它的反思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把握。其次，文学教育的内涵也不应该局限于课堂和学校的教育，还有社会上的文学教育；再次，文学与知识的关系也不限于对文学的认识结果，还包括文学实践，因为文学创

① 李广田：《论文学教育》，文化工作社1950年版。

② 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也涉及知识问题。

罗岗的主要对象是文学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即文学可以教育（与它的独创性的矛盾），而我们的意图是问文学作为知识在古代也有，但是和现代有什么不同，这点和新知识人的总体知识结构之间有没有相关性。罗岗也考虑到“知识”在跨文化和跨语际传播中所产生的误解、差异与创造性的挪用，我则把这种挪用看做“情境”，视为新文学知识内容的扭曲因素。

本书真正的问题是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之间有什么联系？新文学是如何在知识转型中发生的？知识转型究竟对新文学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 解决问题的思路

思想史的方法忽略了思想的语境相关性，因此要深刻地考察这些问题，仅仅从思想史层面看是不行的；仅仅关心知识生产和文学教育，而不结合文学的整个知识特性来考察也是不行的。

在追踪《新青年》同人提倡新文学的时候，不免让人疑惑，他们真的是科学的代言人吗？如果他们不是在社会上承载某种身份，他们还会鼓动新文学吗？新文学得到社会认可的情况如何？得到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呢？认可仅仅因为真理吗？思想的发展真的像思想史所描述的那样是真理实现它自身吗？

因为思想总是与人相关的，不同的人选择自己的思想，一面因为教育，一面也因为立场，思想既然与教育相关，一定属于某种文化，而文化又永远是属于某个群体的。思想并不总是像光一样不占空间的，也不是像空气一样可以任意扩散的，思想和知识一样是有结构的，某种团体的思想总是具有那个团体的印记，固然有些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排列组合却是不一样的，带有团体的徽章（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阶级的意识形态，后来发展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法文 champ，英文 field）理论认为，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也就是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着客观关系的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它的存在并非想象的，而是一个力量作用的空间，它的边界就在没有力量作用的

地方。^① 这个客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认同。是认同使得各个社会位置上的个人形成团体，构成场域。因此，提出新文学这种新异思想的知识人必定有他们的认同。

林顿指出：“如果几个人对某一特殊形势的反应相同，那么一定要在这些人的共同经验上找原因。显然，来自同一社会的成员要比来自不同社会的成员所掌握的共同经验资源多得多。”^② 同样，《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共同性，也要从“前《新青年》”的共同经验出发。割裂地看，强调新人与他们的前辈之间的不同之点，这样固然可以清楚地描述他们，但是就像从单个的植物标本不能得出一时一地植物生存状态一样，不比较前辈的特点，而仅局限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往往会把前辈旧有的特点误当做后人的特点。^③ 因此要关注新型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从知识人的背景来看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和思想观念，以便正确评价他们思想的地位和独特性，区分哪些是时代主题，哪些是别人提出来而他们又加以什么样的完善的。

通过人在社会上的活动来反映一种思潮的转换和过渡，这种做法唯一的困难在于：人群的思想很多时候是来自他人的，20世纪初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印象，思想与身份并没有紧密的联系。但是那时外国的理论和主义去除了历史性，平面地呈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也会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这个角度切入，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地认清《新青年》同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真相。

较早通过权力斗争来理解新文学的是王晓明，他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里率先引入这一视角，后来也有学者陆续有所贡献。^④ 但是这样做的学者还不太多，大家还是习惯性地仅仅关注思想史。为了克服单纯的思想史方法，打开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本书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视

① [法]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现在一般将“布迪厄”译成“布尔迪厄”，本书即采用后者。

② [美] 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于闽梅、陈学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③ 罗福惠：《后记》，《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④ 张宝明在《多重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中，也采用了知识社会学角度，但是他主要用来解释《新青年》同人中师生之间的知识嬗变。此外还有刘纳对创造社的研究。

角，希望通过知识的追寻，打破思想和学术，维新和革命的界限。

在知识转型的背景下讨论新文学发生是有益处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是一个过程，虽然《青年杂志》的创刊可以被看作一个运动显性的开始，但它究竟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接续的视角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不能割裂地看新文化运动的“新”，忽略它们的“旧”（新人的选择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和前人的对话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唐德刚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定义时指出：“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①文学、文化革命也是如此，它虽然和政治的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的脉络。我们从知识转型的角度切入，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时期算起，通过人员在社会上身份地位的变化起落，既解释他们的思想来源，又解释他们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这样，新文学发生就避免了确认新文学特性以后向前寻找与它相似的因素和条件作为它发生的源头。

另外，在知识转型背景下研究新文学发生，还能够把它还原为新文学知识范式的建立问题，也就是新文学知识范式如何在知识转型的背景下确立？以及这一确立对于中国新文学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带来什么影响？

当然，对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之间关系的考察，我们不能从概念出发，特别是不能从西方知识型的一般规律出发，将其硬性地带在中国的转变上来。因为现代知识型在中国生根发芽，会发生种种变异。因此需要细致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型建立的真实状况。这也要求我们关注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建立之重要方面的知识人转型。因为对某种知识型的接纳、理解与掌握是一个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或被知识分子群体接纳的前提。反过来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能够有共同的社会意识和身份，也是因为它们共同分享了这种知识型，通过教育加以扩展。^②

既然要通过研究知识人的身份，以及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

^①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5），（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89页。

^②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研究他们的特点和给新文学带来的影响，显然要借助于知识社会学的某些论断，以及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某些分析模式，还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然而，本书对理论保持高度警惕，将努力使用新材料来推动认识的进步，因为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部分颠覆或修正了我们原先的文学史/文化史想象”^①。通过清末民初期刊和传记材料的引入，可以改变文学史视野。

是《新青年》同人将早先启动的知识转型与后来的新文学联系了起来，正因为有他们的活动，新文化和新文学才会产生和发展。因此本书中关注较多的是《新青年》同人的活动情况和历史地位，当时知识界的动态也是围绕在他们的身边才有叙述的意义。

出于以上考虑，本书的思路为：进入新文学发生之前，先要了解清末民初中国知识转型的情况，即中国知识转型是什么？如何实现的？有哪些特点？然后再讨论知识转型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发生原因。最后是对新文学在知识转型背景上发生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

^①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第一章

中国现代知识转型

西学东渐由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涓涓细流到清末民初的大潮澎湃而至，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虽然其间多有阻滞，但是西学知识一步步坚实地向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进发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到 1840 年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与之相比，早年马嘎尔尼的小交涉都不过是前哨战。

一系列的冲突裹挟着枪炮、死亡，伴着屈辱和惊异，表面上是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服务，但其背后是文化的较量。帝国主义的扩张不过使两种有差异的文化进入一个角力场而已。有意思的是，马嘎尔尼来送礼时纷争的焦点就是礼节问题。要不要跪拜清朝皇帝是文化冲突的第一次亮相。

到了清末民初，文化冲突从行为礼节和伦理习俗深入到知识层面。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中国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的觉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他认为，这些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他说的“文化根本”就是文化的知识体系，他说“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偶像的改变正是知识体系变更的征兆，他的描述正好反映了知识深化的路径，从自然科学技术的引入，到政法知识的引入，再到西洋全面知识的引入和深化。梁启超直觉到此前四十几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①。这个巨大的思想变化，现在学者称之为知识转型，或者称为学术转型。

^① 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 14 卷，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30 页。